作文话题3：孔子及《论语》 **(三)**

**编者按**：多读书、好读书、读好书、读整本的书，是落实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。本期作文围绕“孔子及《论语》”，推出讲话稿、读后感、演讲稿、思辨、论道、温故等文章，以飨读者。（庄伟强 整理）

**告诉你一个真性情的“孔老师”（演讲稿）**

■杨照

在一些人心目中，孔子是一个老是板着面孔训话、训了之后还要人把他的语录当作真理背下来的古板形象。我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 而我对孔子看法的改观，要从子路之死说起。
 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中记录，有一年卫国发生大乱，起因是被卫灵公赶出卫国的太子蒯聩想要回国建立势力，他去找外甥孔悝结盟。孔悝拒绝了他，他一气之下便用武力挟持了孔悝。孔悝的家臣子路闻讯后不顾劝阻，马上赶来与蒯聩当面对质。蒯聩又气又怕，就派了两个年轻的吏士对付子路并“以戈击之”。
 当时子路63岁，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者。子路临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不是留下遗言，而是捡回了打斗中掉落的帽子，重新将帽带绑好，“君子死，冠不免”。
 子路死后，有使者向孔子报讯，孔子非常难过。据《礼记·檀弓篇》记载，“孔子哭子路于中庭”。古文中的“哭”并非流泪，而是大嚎。当时的礼术教育人们要节制情绪，而孔子作为一辈子授礼之人，竟然在72岁时因为子路之死而失礼了。
 读到这里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——孔子不再是书中高高在上的“至圣”，他原来是一个感情如此丰沛的性情中人。
 后世将孔子称为“至圣先师”，在我看来，“至圣”只是一个空洞的头衔，而“先师”才是对孔子最大的褒奖。为什么这样说？这要从西周的教育制度讲起。
 当时官府垄断了学校和教育，只有贵族才有机会接受教育，这种官学合一的现象被称为“王官学”。王官学最重要的是讲究身份，这种在同宗族系统下的教育体系并不存在师者身份，常常是爸爸教儿子、哥哥教弟弟。
 而孔子是倡导“有教无类”的第一人，“无类”其实是对当时的教育制度的颠覆和革新。只有一个内在流淌着叛逆血液的人，才能实现前人未曾做过的事。孔子很像希腊神话里的“盗火者”普罗米修斯，后者把原来专属于奥林匹亚山诸神的火种偷盗后交给了人，打破了人和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。而从孔子的时代开始，个人无论出身贵贱，都拥有了接受教育、获取知识的权利。
 很多人都说，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儒家教育。其实，孔子所教授的并不单纯是一套用来换取俸禄的知识和技术，孔门教育分为五个阶段：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。
 第一个阶段是“博学”，尽可能地“学”；因为“学”是外在和被动的，所以第二阶段要“审问”，要动脑子，主动去追求知识和能力；第三个阶段是“慎思”，要把不同的信息、资料、知识和能力整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系统；“明辨”是指要识好歹，除了对错，还要明辨好坏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品位；“笃行”，指的是不能将知识一直留在脑袋里，要去实践。
 《论语》从头看到尾，你看不到孔子开大班课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里记录了孔子上的一次最大的课，是同时教授5个学生。大部分的时候，孔子的教育都是一对一进行的，因材施教。
 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被称作“五常”，是儒家所提倡的做人的5个基本道德准则。而“仁”是孔孟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道德条目。在《论语》里，孔子讲“仁”的地方很多，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。其实，认识孔子的正确方法，是看孔子对不同的学生解答“仁”是什么。
 比如，《论语·颜渊篇》中，颜渊问他“仁”是什么，孔子回答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要实践“仁”，靠的是自己要节制欲望和冲动，回归到“礼”的规范之下。颜渊接着又问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实践原则呢？孔子回答说：“非礼勿视、非礼勿近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动。”
 孔子会结合每个人的不同个性，不断摸索和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法。例如，司马牛最大的性格问题是说话快、没耐心，喜欢反驳别人。所以，司马牛问孔子何为“仁”时，孔子回答说：“仁者，其言也讱。”这个“讱”字，指的是说话迟钝，不锐利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有美德的人会慢慢说话，而且不会刺激到别人。实际上，这是孔子的幽默感，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。他故意用话“修理”司马牛，劝告弟子说话要谨慎。
 总而言之，孔子是一个真性情的人。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开创者，他创造了老师这个社会身份，改变了学习的意义。
 在《论语》的很多对话里，孔子多次提到如何做一个快乐的人。孔子讲到的快乐，都与学习有关。比如，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这个“习”并不是复习备考，而是将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，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成果，这样你便会得到最大的快乐。

**孔子两极思辨中的和谐论（思辨）**

■王建堂

两极思辨，即关于同一矛盾体中两极关系的思考辨析。《易经》中最经典的思维模式即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阴阳对立统一，即为两极思辨之主体对象，它外化为有关社会、人生的多种指向，而《论语》中就充满了对这些指向的两极思辨的结晶——两极和谐、方臻佳境。

**文与质——文质彬彬**

　　文与质，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，亦即两极；文即形式，质即内容。二者的关系如何？《论语·雍也》篇云：“子曰：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意为：质实多于文采，就未免粗野；文采多于质实，又未免虚浮，文采和质实和谐统一，这才是一个君子应具有的品格。这里的“质”第一语意是质朴，可引申为质实、内容；“文”的第一语意是文采，可引申为外在形式。当然，文与质是事物的两极，人们在处理二者关系时，受行为心理定势的影响，往往会偏颇一方：要么质胜文，要么文胜质。偏颇于任何一方，都达不到事物的最佳境界。那么怎样才能臻于完美呢？就是二者和谐地统一。儒家后学对此有共识。在阐释“彬彬”时，有云：“文质相半之貌”；有云：“物相杂而适均之貌”；有云：“文质得其宜也。”这里的“相半”、“适均”、“宜”的共同指向就是和谐。另外，关于“文质”，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中还有不同的表述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云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即：言词足以达意便罢了，强调了质实；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引孔子语云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”又强调了文采，即：语言如果没有文采，就传播不到很远的地方。总之，他看到了一个矛盾体的两极，是对立统一、互为依存的；像一个人的双手和双腿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需要和谐配合，才能有效运作。故，文质之间，和谐至上。

     **学与思——学思并重**

　　《论语》开宗明义：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！”但是，学习这一特殊的认知行为，亦辐射着两极走向，即学与思。天才教育家孔子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。《论语·为政》篇云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即：只读书不思考，就会使人迷惘；只空思不读书，就会使人迷惑。思由己出，学自外入；学而不思，则内无自得之明，只是两脚书橱，故迷惘；空思而不学，则外无多识之益，只是井蛙之见，故迷惑。所以学习也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即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——只有这样广博的学习、审慎的思考，忠实的践行，才会对人生有所裨益。故，“学与思”应和谐并进，共臻佳境。关于这一点，哲人所见略同。荀子曰：“诵数以贯之，思索以通之。”扬雄曰：“学以聚之，思以精之。”是思以学而后得，学以思而后精，二者相得益彰，绝对不能偏废！孔子有许多饱含生活哲理的言论至今被人们奉为圭臬，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：学思并重，和谐一体。

     **过与不及——过犹不及**

　　人们平常做事时，有时会陷入“两极”的尴尬境地：要么是超过了，要么是赶不上。是不是超过了要好一些呢？不尽然。“过犹不及”，这是先哲孔子早就悟出来的至理名言。《论语·先进篇》云：“子贡问：‘师与商也孰贤？’子曰：‘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’曰：‘然则师愈与？’子曰：‘过犹不及。’”意为：子贡问孔子，子张与子夏谁为贤才？孔子回答说：子张有些过分，子夏有些赶不上。子贡又道：子张更强些不更好吗？孔子回答道：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。对这一段经典对话，朱熹《论语精义》释云：“道主于中而已。贤知者过之；愚不肖者不及”；“过与不及，皆非中庸”；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夫过与不及均也……故圣人之教人，抑其过，引其不及，归于中道而已。”中庸为儒家之至德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？就是拉平两极，取其中道，臻于和谐。其实，过犹不及，亦堪称最佳“方法论”，也是孔子教导学生的为政之道。子夏做了管理莒父的长官，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，孔子语重心长地告诫他：“无欲速……欲速则不达。”意为：不要求速成，想速成，最后反而达不到目的。也就是不要图快，太快了反而适得其反，前功尽弃；要成功，就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，获取一个恰到好处的匀速值，这样才能既好又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虽然“过犹不及”的原生态语意是孔子对其两个学生品性的评价，但后来却积淀为一种科学的“方法论”，这就是：快慢两极之间，要和谐出一个能达到“最佳效果”的“优化值”。

     **事与器——器利事善**

　　人是目的性很强的动物，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，要想快速圆满地做事，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工具——器；而“事”与“器”亦为矛盾同一体中的两极，要想事半功倍、圆满成功，就得求取与把握“事与器”之间最佳的“和谐值”，即如《论语·卫灵公》篇中所云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就是说：工匠要想很快、圆满地做成他的事，就必须首先修整好他的器具。正所谓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孔子此经典名言也具有“方法论”的意义，即重视方法对目的实现的重要作用。孔子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重视“方法”的，尤其是教育、教学方法，如：因材施教、不耻下问、三人行必有我师、举一反三、学而时习、切磋琢磨、绘事后素等，都是在强调和探讨“方法”的重要性。总之，“事”与“器”，也是同一矛盾体中有机的两个方面。当然，“事”为矛盾主要方面，但也不能忽视“器”这个矛盾次要方面，在特定的条件下，它也可能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。所以，如果要关注事物的整体效应，两极和谐的思想就非常重要。若要“善其事”必先“利其器”，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。孔子形象地揭示出了“事与器”，即“目的”与“方法”之间辩证的和谐关系：器利事善、共生共荣。

　　**哀与乐——恰如其分**

　　哀与乐为人之情感的两极，哀极生狂，乐极生悲；人在经历这两种情感体验时，不能让其放纵奔流，而应该理性地调节、控制，争取能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情感状态。孔子在评价《关雎》时，就运用了这种情感尺度。《论语·八佾》篇云：“子曰：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孔子说：《诗经·关雎》篇，快乐而不过分，忧思而不悲伤。其实，乐而不至淫，哀而不至伤，就是哀乐中和，恰到好处。朱熹释云：“《关雎》……诗之首篇也。淫者，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；伤者，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……盖其忧虽深，而不害于和；其乐虽盛，而不失其正……欲学者，玩其辞、审其音，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。”《诗经》是礼乐文化的积淀，孔子编订《诗经》时为何要将《关雎》作为压卷之作？除“修身齐家”之伦理层面上的意义外，就是激赏其哀乐情感表达恰到好处的“中和之性”，亦即：“琴瑟和谐”论。孔子反对情感的极端化，自己的情感也把握得恰到好处，正如其学生所描绘的：“子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即：孔子温和中寓有严厉，有威仪但不凶猛，庄严中寓有安祥。两极之间中为上，即：温良恭俭让。这就是孔子追求的和谐情感最佳值。

　　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生命常游弋在“两极选择”的“两难”境地，孔子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，也曾面临着“两极两难”的选择。丰富的阅历，广博的知识，卓越的见地使他原创了“文质彬彬”的“两极和谐论”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缕永远的理性曙光。